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一、研究動機

自 1970 年代起，國際上由於布雷頓森林體系(BWS)¹崩潰、石油危機出現、微處理器發明等一連串事件，國際關係丕變，進入了所謂的「新國際分工」(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)時期(Yue-man Yeung：2000；王振寰：2002)。於此前提下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鬆散，相反的，各國在資金、人員、資源的相互交流下，聯繫反而更爲緊密，「全球」概念遂逐漸成型，且自 1990 年代起，出現了「全球化」此一廣泛流通於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名詞。

關於「全球化」的內涵，學者們定義與強調重點各不相同，有的學者認爲「全球化」是指全球經濟交流的無遠弗屆，有的學者強調「全球化」與「國際化」在「質」與「量」上的差異(周志龍：2001)，有的學者則認爲「全球化」是指兩種同時發生的獨特現象，即「範圍擴展」與「密度變大」，前者係指一種空間上的連結，亦即互動的範圍包括全球大部分地區，且包含範圍日益增加，後者則指互動層次的加深，不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更爲增加(A. McGrew：1992)。也有學者從「全球流動」(global flows)的概念切入，指出資金、人力、資訊、技術與產品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不斷增加，這些流動並不具有同質性的效果，同時，流動的資源也可能產生一種「解疆域化」(deterritorialization)的影響(Pred & Watts：1992)。

儘管有上述論點的差異，但依照赫爾得(D. Held：1999)的觀點，可將學者對「全球化」的分析區別爲三大類，分別是「極端論」(Hyperglobalizers Thesis)、「懷疑論」(Skeptical Thesis)與「轉化論」(Transformationalists Thesis)三種(D. Held：1999；徐斯儉：2000)。在「極端論」的觀點中，認爲「全球化」是個已然成型

¹ 即二次戰後以美元爲主的國際金融體系，但因各國陸續以本國央行進行匯率調整，使其失去主導作用。

的現象，並且導致了民族國家(nation-state)的終結 (O'Hare：1995)；相對的，持「懷疑論」的學者則質疑目前所稱的「全球化」現象是否不同於以往的「國際化」，同時以具體數據指出目前國家間的貿易，並未遠遠超過上個世紀初期各國之間的貿易量，更懷疑目前各國交流的情形只是「區域化」而非全球化(Paul Hirst & Grahame Thompson：1999)；至於折衷的「變革論者」，則承認目前的確處在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情境中，並在生活上發生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經驗，但是，這並非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，因為在斷裂中仍然有許多現象間的延續(A. Giddens：1990)。就以上三種觀點而言，儘管理論上有所分歧，但是，就論述的實質內容而言，任何一種傾向，似乎都承認「全球化」現象的出現是個不爭的事實，而其間的爭議，無非是一種程度上的差異罷了(趙剛：2001；劉曙光：2003)。

於此「全球化」的背景下，最重要的特徵便是跨國公司(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, TNCs)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。藉著科技的發展，使得全球各地的資金、資源、技術、人才得以跨越地理藩籬進行流通，大規模的公司開始運用上述流通性，在全球各地設立地區總部與分支機構、不斷擴展，並形成一個無形的全球經濟網絡(Dicken：1992)。但是，這卻嚴重衝擊到民族國家(nation-state)的影響力。

儘管民族國家是否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，特別是，跨國公司是否對民族國家的統治能力造成衝擊，學界仍有不同看法(Gilpin：2001)。但現實上，各個民族國家已經開始因應此一變局並進行調整，不僅根據「新自由主義」(neo-liberalism)論述，對於全球資源、資金等交流等給予最小限制以及最大的輔助；同時，更主動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發展，亦即設法吸引全球經濟網絡中的跨國公司進駐，特別是進駐到民族國家的重要城市內，讓城市發揮作用，成為全球經濟交流中的「節點」(node)，以期進一步在全球環境下發揮影響力。上述所提到的這些「節點」，即是所謂的「全球城市」(global city)，或是「世界城市」(world city)，儘管名稱上有所差異，但都指出這類城市在「全球化」的背景下，成為跨國公司的進駐地，並具有影響全球經濟的能力。

儘管對已開發國家而言，吸引跨國公司進駐重要城市，有助於該城市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，且更能夠提升城市與國家的綜合競爭力。然而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，情形則大有不同，不僅無法與跨國公司處於平等的地位，相反的，為了能夠納入「全球化」的局勢中，更往往必須提出許多優惠條件以吸引跨國公司進駐，形成了受制於跨國公司的局面。因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跨國公司所引入的資訊、技術與管理方式來帶動國家經濟的發展，因此，不得不提出優惠條件吸引跨國公司進駐，這樣，不僅造成國家利益的喪失，更使得國家主權被迫削弱(賈英健：2003)。不過，這樣的推論也可能過於籠統，因為，儘管是開發中國家，但其是否在「全球化」的浪潮下必然受制於跨國公司的影響，可能還須隨不同民族國家而有差異，此外，若是從「疆域」(territorial)的角度來看，也許民族國家的治理能力並不是消失，而是轉換為不同層次的國家單位進行治理，亦即地方政府的治理角色更形重要了(Appadurai, A.：1996；Neil Brenner：1999)。

因此，在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博奕關係中，不管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，莫不積極發展國內重要城市，以吸引跨國公司進駐，並冀望能夠成為對全球資金、資源或是人力發揮影響力的單位。因此，對於城市的研究，特別是對於能夠影響全球經濟、政治發展的「全球城市」，成為近來研究者關注的焦點，而面臨此一情勢轉變下的現代城市政府，也逐漸從以往對城市的「管理」，轉化為對城市的「治理」，在職能方面進行積極調整，以因應環境的變化。

上述內容指出「全球城市」分析所具有的實際意義，但是學者們對於「全球化」現象、「全球城市」的理論緣起及爭論內容，分析對象多侷限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城市方面，不免顯示出分析個案的偏頗；較為適當的檢視方式，應該是針對非西方「民族國家」與「城市」來進行檢視，分析這些城市是否也受到「全球化」的影響，是否也出現上述政治、經濟爭議以及民族國家治理主體的職能轉換，以做為理論是否獲得支持的證據。

於此前提下，中國無疑將是最好的檢視對象，蓋因從全球分工的觀點來看，東亞地區在世界經濟所佔的角色已經愈形重要，再者，東亞地區發展較好的日本

經過九十年代初期的泡沫經濟、後起的東亞四小龍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都受到了影響，並各自進行著產業結構的轉型，唯獨中國，能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較少創傷，且承接各地產業轉型的利基，成為金融風暴後經濟持續強勢發展的地區。

此外，就中國內部而言，既有經濟體制發生轉變，自從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」的概念以來，中國淡化既有計畫經濟體制，強化市場經濟、積極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，並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)，此一具體發展態勢，更可由中國大陸幾個著名城市如上海、北京等積極建設，期望成為「全球城市」的一連串努力中看出，這些事例都指出「全球化」與「全球城市」的論證，有必要將探討的焦點從西方社會轉移到非西方的社會中。

將「全球化」與「全球城市」的分析視角轉移到非西方的中國，可以看出自從 1978 年進行「改革開放」以來，中國便積極開始向外接觸以尋求發展，在此目標下，採取讓部份人先富起來的「非均衡發展政策」(Dali Yan：1990；George C. S. Lin：1999；劉佩瓊：1994；王一鳴：1997)，基於該政策，中國在八十年代開始即採行了一連串對外開放措施：

1. 1980 年首先年開放了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等四個經濟特區，之後更於 1988 年開放海南島為第五個經濟特區，在這些地區採行部份資本主義政策，以作為對外開放的實驗窗口，。
2. 1984 年在沿海開放了 14 個「沿海開放城市」，分別是大連、秦皇島、天津、煙台、青島、連雲港、南通、上海、寧波、溫州、福州、廣州、湛江、北海這 14 個沿海城市。
3. 1985 年開放「沿海經濟開發區」，著重在珠三角、長三角以及京津唐環渤海地區。

這些陸陸續續提出的開放政策，在八十年代形成了「一環」--環渤海地區、「一島」--海南島、「一灣」--渤海灣、「一江」--長江、「兩海」--北方沿海與南

方沿海、「四個三角洲」--珠江、長江、黃河、閩南等四個三角洲的發展態勢，或是沿海、沿邊、沿江等三沿政策(馮之浚、張冠生：1994)。

到了九十年代，進入了「多邊多向」的開放時期，形成了沿海、沿邊、沿江、沿歐亞大陸橋的全方位開放方針，顯示出由南向北、由東向西分層推進的發展政策(蔡來興：1992)，並於 1999 年首次提出「西部大開發」，儘管造成了發展上的不均衡(耿曙：2002)，但「使部份人先富起來」的開放政策，卻也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，並曾一度以每年二位數的經濟成長率，展示其傲人的經濟成就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，更提出「振興東北」等發展策略，顯示改革的步伐已經逐漸從沿海向內陸深入。

而為了積極融入全球脈絡中，不僅在經濟上與各國進行資源、貿易、金融等方面流通、參與國際活動，更開始發展城市建設，以吸引跨國公司進駐，九十年代以城市為主軸的改革政策，產生了較為可觀的聚集經濟。根據財富雜誌的估算，中國的財富約有 70%是集中在城市部份，同時城市所產生的收入約為農村地區的三倍之多，另外城市所產生的需求、對市場的投入，也都遠遠領先農村(Fortune , 11 October 1999)。於此前提下，中國城市的發展更重點式的集中於某些城市，以作為與世界各大城市相聯繫的節點(node)。而其中，具有七百年發展歷史的上海更被認為是最具有發展成為「全球城市」的一個具體範例(Fulong Wu：2002；王振寰、黃書緯：2001；簡博秀：2002；冷則剛：2003)。

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積極建構的「全球城市」，有其歷史的脈絡，早於現在香港、新加坡所具有的東西文化融合的特色，自十九世紀中葉起，上海便是中國首批開放的通商口岸，開始進行對外貿易，1936 年，更成為全世界第七大城市，被喻為東方的巴黎。不過這樣的榮景並沒有持續多久，1949 年中共建政後，上海在中國大陸的整體發展計畫下，由消費性城市轉型為工業型城市，除了大舉興建工廠外，在與中央的財政關係上，始終是上繳稅收的重要地區，每年上繳全市過半的收入，這種情形甚至延續到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初期(Zhimin Lin：

1994；Anthony G. O. Yeh：1996），使得上海不僅無法利用既有的優勢，更在改革開放的初期，落後於南方廣東、福建等經濟特區。

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及「全球化」浪潮的影響，中國區域發展政策逐漸從比較利益的觀點著眼。上海則在既有的優勢下，成為發展為國際都市的一張王牌，1992年，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更確定了「以上海浦東開發為龍頭，進一步開發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沿江地區」的重大決策(岳咬興：1993)，使得上海不僅可藉由開發浦東以重塑其既有的地位，更藉由與長江沿江各城市的聯繫，成為長江三角洲的發展龍頭。

在中央與上海市政府政策強力主導下，上海開始展現傲人的經濟成就，在1992—2001的十年中，其年均經濟增長達12.5%；到2005年時，生產總值已經達到9143.95億元，使上海連續14年經濟維持二位數增長。另外，就產業結構而言，截至2002年止，其第三級產業生產水平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50.7%，首次超越二級產業，顯現出上海「三、二、一產業結構」的目標已初具成果(石磊：2003)。另外，不同學者針對中國城市競爭力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，上海在許多研究中，都被視為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城市，如王桂新、沈建法(2002)針對中國地級以上城市在「經濟發展競爭力」、「社會發展競爭力」、「環境發展競爭力」等三項指標綜合而成的「城市綜合競爭力」評比中，上海被評比為全中國最具有綜合競爭力的城市，除了在環境發展競爭力方面略遜於北京外²，其餘的子項目皆居於全國首位，領先第3名的北京、第8名天津、第22名重慶等三個直轄市(王桂新、沈建法：2002)；在2003年底，由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所公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當中，上海的城市競爭力僅次於香港、台北³，城市成長競爭力則居於全中國第一；2004年由中國社科院所發表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，上海在200個城市中，其綜合競爭力(包含綜合增長率、綜合生產率、綜合就業機會、綜合市場佔有率、綜合人均收入)也是排名第一(倪鵬飛：2004)。這些數據充

² 這裡的「環境發展競爭力」，主要包含了城區規模、城市建築、公共運輸等方面，不是單純就環境而言。

³ 大陸相關研究，皆將台北納入評比範圍中。

分顯現了上海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的可能性。

儘管上海的發展有其本身的優越條件，然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，上海的發展仍然必須依賴於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的優惠，如 1992 年起浦東的開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，此外，歷任市長的晉升，如 1985 年的江澤民、1987 年的朱鎔基晉升北京領導階層，甚至產生了「上海幫」的稱呼，這些使得上海與北京當局的關係聯繫緊密，也有助於其獲得中央優惠政策而形成進一步的發展。

因此，在上海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過程中必須指出的是，有別於西方「全球城市」，上海是隸屬於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城市，其發展過程勢必包含著更多的國家力量，在建構以經濟發展為主的「全球城市」，社會主義背景下的上海，如何體現國家、政府的政策影響力，這可能是在探討此一社會主義制度下的「全球城市」，能夠展現特殊之處所在。

二、研究目的

從上述的討論可知，在「全球化」的發展脈絡下，不論採取何種經濟與政治體制，任何國家都無法迴避「全球化」所造成的影響，這些影響除了表現在既有的經濟領域外，政治領域的主體—民族國家，也會對此做出某種程度的回應，中國積極建構「全球城市」以參與全球性的國際分工，便是一個明證。

然而在思考上仍須保留的是，基於西方發展脈絡所提出「全球城市」概念，是否適用於中國大陸此一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？因為源於西方的「全球城市」概念較為強調城市本身的自主性，然而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體制下，國家的影響卻遠大於市場的作用(王佳煌：2002；冷則剛：2003)。此外，上海在發展成為「全球城市」的過程中，如何證明其建構的目標已然達成？在哪些標準上與既有的「全球城市」(如倫敦、紐約、東京)相同，這些都是必須進一步加以分析。

基於以上的思考，本研究目的在於：探討「全球城市」的概念內涵，並進一步以「全球城市」理論與指標為基礎，對「上海」此一個案進行分析，以檢視上海能否建構為一「全球城市」，在此目的下，主要的探討問題有：

1. 「全球城市」是如何建構形成的？

2. 「全球城市」具有何種特徵？指標如何認定？
3. 「全球城市」的可能發展趨勢為何？是否已發生了性質轉變⁴？
4. 基於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背景，上海市政府如何建構上海市為「全球城市」？具體的研究問題包含：
 - (1) 上海市政府如何進行城市建構？包含城市人口的分布與空間規劃。
 - (2) 上海市在發展的過程中，如何運用中央政府給予的政策優惠進行發展？
亦即，上海市如何配合中央規劃的四大中心，進行城市的發展與建設。
5. 「全球城市」不僅強調城市本身的建設發展，更關注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聯繫，因此，在這個前提下，筆者欲探討上海市與其周邊的其他城市、上海市與國外的其他城市聯繫的情形如何？
6. 由於「全球城市」的建構，必須放在「全球化」的脈絡下進行理解，且十分著重市場經濟的原則，這對於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上海市政府，無異提出了進行「轉型」的要求，而上海市政府要如何進行「轉型」，以面對這些變局，亦即，地方政府在「城市治理」方面產生了哪些創新的舉措，並如何進行本身的調整加以因應，「轉型」之後的成果如何，是否更有助於上海市建構「全球城市」，這些都是必須檢證的議題。

因此，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與研究議題，本研究將對於上海市建構「全球城市」的過程進行分析，並指出其受否達成設定的目標。

⁴ John Rennie Short, 2002, "Cities and Globalization." *GaWC Annual Lecture*, (<http://www.lboro.ac.uk/gawc/rb/al4.html>)在此演講中，作者在「global city」的基礎上，提出了「gateway city」，認為全球化會使得每個城市成爲一個「通道」(gateway)，各種資源將經由此而流通。

第二節 研究範圍、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

一、研究範圍

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，在於探討上海市是否能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，特別是上海市政府在此建構過程中，實行何種政策，以及如何轉換政府職能來達成上述目標。

在研究過程中，除了探索「全球城市」如何被定義，及其概念演變外，更著重上海市在發展中，城市本身所發生的轉變，不僅涉及城市人口規模與分布、城市空間佈局，更強調上海市在建設為國際經濟中心、國際金融中心、國際貿易中心與國際航運中心時所做出的政策規劃與成果，進一步也要分析上海市與周邊城市以及全球其他城市之間的關係，最後，則要檢討上海市政府如何進行職能轉換，採取哪些「治理」對策以完成上述的轉變。

上海市政府在發展的過程中，由於獲得了中央政府強力的奧援，所以在行政權力增加、財政自主性，以及政府職能轉變方面，都產生了極為傲人的成果，上海市內部的討論焦點，也從「是否要經營城市？」轉變到「如何經營城市？」(周誠君、陳雯、張亦祥：2002)。然而，今後是否能繼續在法規規範方面、基礎建設方面、與區域以及國外聯繫程度方面更為完善，以建構成所謂的「全球城市」，似乎仍待持續的觀察，至少，就上海市目前的情形而言，仍存在相當多的建設困境⁵。同時，與倫敦、紐約、東京等著名的「全球城市」相比較，上海在許多指標方面仍顯示出過大的差距(甄明霞：2001、2002)。因此，分析上海發展現狀，

5. Duo Wu and Taibin Li,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Urban Community, 他們認為，包含有：

(1) 交通方面的問題：

由於新舊城區之間的距離太過遙遠，所以使得交通的問題變得相當的嚴重，同時通勤人口增加、學童就學困難等，都是亟需克服的困境。

(2) 需要建立健全的地產公司與行政管理：

基本的生活機能以及居住環境，並沒有隨著新區的建設完成而同時完成，因此成為新社區的建設目標。

(3) 重視物質忽略社會文化因素

由於過度重視物質的發展，導致了都市人的冷漠情況出現⁵。

(4) 新居民的適應問題

由於部份居民是由原先農地遷居的農民，使得部份農民進入到都市之後，發生了適應上的問題，如利用城市的綠地種植農作物等

並找出上海如何在十一五計畫期間更進一步發展，迎頭趕上既存「全球城市」的水平，也成為本研究關注的議題。

根據上述目的，本研究所設定之研究範圍與對象將鎖定在 1990 年至 2005 年的上海市，之所以將研究時間設定在這個範圍內，主要考量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市缺乏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，處於發展落後於南方各省的窘境，但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，上海市政府獲得中央明確支持，著手進行浦東新區開放開發的建設，更藉由浦東新區的發展，使上海逐漸回復到以往繁榮的城市景象，城市競爭力顯著提升，開始「全球城市」的建構過程，因此，本研究時間將設定在 1990 年至 2005 年這段期間的上海市。

二、研究方法

有關「全球城市」的研究中，研究方法向來最常受到質疑，因為將「全球城市」理論進行量化並選擇指標時，往往缺乏比較的基礎，如 Taylor(1997)便指出，在測量全球城市時，學者們使用的測量資料，往往流於兩種困境中，不是使用屬於國家層次的資料，就是城市本身特質的資料，所以往往欠缺表現「城市之間」(inter-city)「關係」的資料(Taylor：1997)，亦即無法進行城市之間的比較。

因此，近來學者們在進行全球城市的研究時，特別針對研究方法進行檢討並尋求可以分析「城市之間」關係的方法，如在 J.V. Beaverstock, R.G. Smith, P.J. Taylor, D.R.F. Walker and H. Lorimer (2000)的文章中，便提出了可以使用「內容分析法」、「深入訪談法」、「次級資料分析法」等方式，以分別測量各個「全球城市」之間的關連性，同時進行資料的標準化，以利後續研究的比對。此外，中國學者蔡建民(2002)、香港學者薛鳳旋(2002)也指出，既有測量全球城市的研究方法，在量化分析上，主要集中在測量該城市的「銀行數」與「跨國公司總部的數量」，多是偏向單一維度的研究指標，且多半著重在經濟層面或是基礎設施方面的探討，因此設計出了六個維度的測量指標，包含「政治—經濟環境」、「人口—人才」、「經濟活力—控制力」、「能動性基礎設施」、「生活環境—質量」、「城市總體形象」等向度，一方面避免界定「全球城市」時，過於著重定性分析而無法做

定量比較，另一方面也希望避免前述的單一維度的侷限（蔡建民、薛鳳旋：2002）。

因此，本研究在進行中，也將借用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研究方法，探討上海市本身的城市建構，以及上海市與其他城市之間關係的探索，在資料的蒐集方面，採取的研究方法包含：

（一）次級資料法⁶

研究過程中，將針對前述相關內容，檢閱既有的文獻資料等次級資料，主要包括了相關書籍、報紙、雜誌、學術期刊、論文等。

此外，除相關文獻外，尤其著重統計資料的分析，包含上海市「內部」的資料，如浦東、浦西的相關發展、上海市基礎建設、產業結構、科技發展、與中央財政關係的資料。以及「外部」的資料，如外資的投入、進出口貿易方面的資料，希望根據「上海本身的發展」以及「上海對外的聯繫」兩方面來檢驗上海是否已然成為「全球城市」。

（二）深入訪談法

除了次級資料法外，由於研究對象為上海市，因此必須藉由尋訪當地居民以獲得相關的資訊，但礙於筆者接觸能力範圍，故將以當地學者為主要的訪談對象。本研究訪問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周振華教授，上海人口與計畫生育委員會委員孫常敏先生，華東師範大學劉君德教授、寧越敏教授、桂世勛教授，上海復旦大學高汝熹教授，南京大學顧朝林教授以及浙江社科院的葛立成教授、徐劍峰教授等，另外也藉由台商的協助，得以訪問部份在當地進行投資的企業—信義房屋、沛鑫半導體公司等，以期獲得文獻閱讀無法獲得的當地資訊。

學者站在較為中立的立場，比較客觀的看出在上海發展為「全球城市」的過程中，哪些部份已經達到了當初的預期，哪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間，以及上海與西

⁶ 本研究方法，主要在於區別「原始資料」(primary data)蒐集法，著眼於該方法能夠克服資料蒐集先天上的限制因素，如經濟、便利上的理由。詳參 Chava Frankfort Nachmias 著，潘明宏譯，1999，**社會科學研究方法(上冊)**，台北：韋伯出版社，頁 380。

方「全球城市」發展形態的差異。這些第一手的資訊，無疑具有相當的解釋與啓發作用，不過，由於學者本身所提出的看法較具有學理的內容，與實際居民會有認知層次的差異，因此仍須藉前述次級資料進行補強。

再者，藉由接觸當地投資的外資企業，也能較為清楚了解，上海是否足以吸引跨國企業或是外資企業的投入，其優勢與劣勢各在何處等。

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，筆者更針對特定的報紙、雜誌進行深入分析，以檢視上海市在建構「全球城市」時的一些成果，採取的分析方法如下：

(一) 內容分析法⁷

在這裡所採取的內容分析法，主要是受到 Beaverstock、Taylor 等學者在研究「全球城市」關連性的啓發(Beaverstock：2000；Taylor：1997)，在 Beaverstock<<全球化與世界城市：測量方法論>>(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: Som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)一文中，指出對於「全球城市」的界定，除了描述「全球城市」所應該具有的特性外，也必須能反映柯司特(M. Castells)所提出城市之間「聯繫性」的概念，所以提出能夠「代表」城市間關連性的具體指標，即各地所出版的報紙，藉由採取各個城市出版的報紙，分析經濟新聞中與其他城市有關連者的次數與內容，來判斷該城市是否具有全球聯繫性的特徵，而本研究亦採取此種方式，將利用下列三種報紙、期刊進行分析；

⁷內容分析法，屬於「非介入性研究」(unobtrusive researches)方法當中的一種，強調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，爲了避免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回答產生干擾，所採行的一種研究方式。在研究對象方面，則鎖定任何形式的傳播媒介，不限於報紙、雜誌，而是指任何形態(文字或非文字)可加以記錄、保存的傳播內容，以有系統的量化方式加以描述、分析的一種研究方法(Earl Babbie：2004)。就本質而言，內容分析法所進行的是一種編碼(coding)的動作，其中可以明顯呈現出來的客觀項目，稱爲「顯性內容」(manifest content)，必須經由研究者主觀判斷的項目，則稱爲「隱性內容」(latent content)，並藉此兩種內容進行分析研究。在研究設計方面，分爲下列六項，「分析同一傳播來源在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是否有所差異」、「分析由於情勢不同，同一來源的傳播內容是否有所差異」、「分析由於傳播對象轉移，同一來源的內容是否有所差異」、「分析同一來源的傳播內容，不同內容之間的關係形態」、「分析因爲內容差異，不同來源的傳播者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」、「藉由不同的傳播內容來比較傳播表現的成效」(楊孝燦：1988)。

1.上海文匯報

本研究以上海文匯報作為研究對象，採取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，具體步驟如下：

(1)選擇母體：

由於上海市屬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城市，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對於整個城市的發展具有較大的影響力，舉凡政府政策的實施、民意的導向等，消息來源多半是具有政府性質的大眾傳播媒體；此外，由於在台灣地區所能接觸到上海市的傳播文獻中，以「上海文匯報」所搜整資料較為完整，因此，筆者選擇上海文匯報作為內容分析的母體，而由於獲得的資料是從 1994 年開始，所以在這部份的研究母體，將限定在「上海文匯報」1994 年至 2005 年這十二年的報紙內容。

(2)進行抽樣

在進行內容分析的過程中，由於選擇的母體是上海文匯報，時間涉及到十二年之久，因此在進行研究時，採取的是「非隨機抽樣法」當中的「立意抽樣」⁸法 (purposive sampling)，選擇這十二年(1994-2005)當中每週一的報紙進行研究，選擇的理由，在於認定城市重要的議題與事項，通常會在每週一的時候刊登，所以在樣本的挑選中，選擇 1994-2005 年之間每週一的上海文匯報進行分析。

(3)設定類目

在研究中，主要觀察的內容是分析上海市所具有的對外聯繫關係，探討上海是以區域聯繫為主，亦即聯繫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大陸內部各省、市，還是以全球聯繫為主，亦即聯繫的對象主要是其他國家的城市。所以，在類目部份區分為四個類別，分別是：

①內部聯繫：主要指出上海市與中國其他省、市之間的聯繫。

②內部其他：主要指出上海文匯報報導中國其他省、市的新聞內容，而在此內容中並不涉及到上海市。

⁸ 立意抽樣(purposive sampling)，主要屬於「非隨機抽樣法」的一種，用於樣本不易獲得時，主要依照研究者的判斷，或是依照研究目的而決定抽樣的對象。詳參 Earl Babbie 著，李美華等譯，1999，**社會科學研究方法(上冊)**，台北：時英出版社頁 303。

③外部聯繫：主要指出上海市與其他國家、國外城市之間的聯繫。

④外部其他：主要指出上海文匯報報導其他國家、城市之間的新聞。

在選擇的標準中，並不包含體育、影視、戰爭、其他城市發生的軼聞等新聞內容，而著重在經濟、政治發展方面的內容，主要的考量點，是基於「全球城市」---無論是區域型或是全球型，都是以經濟的影響力為主。

而爲了讓分析的層次更爲深入，除了檢視上海與其他「國內城市」、「國際城市」的聯繫性之外，更進一步分析，上海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聯繫，主要是發生在前述章節的那個部份爲主，亦即在聯繫的背景，設定相關類目，包含：

①人口特徵：涉及到人口的流動與人才的交流。

②空間規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具體建設聯繫，特別是在空運、陸路方面。

③經濟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洽談的經濟合作，以及產業發展。

④金融中心：涉及城市內金融機構的設立，如銀行、保險、證券等。

⑤貿易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經貿、商貿、展覽會、投資等。

⑥航運中心：主要涉及到城市之間的海運、河運、空運等內容。

⑦會見其他城市/國家官員：主要涉及城市官員、代表團的參訪。

(4)觀察單位

在本研究中，觀察單位設定爲報紙當中的標題，在對標題進行分析的過程時，爲求客觀性，因此主要以報紙標題的「顯性內容」爲研究對象，區別於著重在傳播內容的主觀判定的「隱性內容」。「顯性內容」則主要是分析傳播內容表面上的字、詞、句等內容⁹。因此，在本研究中，將選擇報紙中所列出的字、詞、句等「顯性內容」作爲選擇的標準，亦即涉及到上海、中國其他省市名稱、外國名與城市名稱，以及上述所提到的人口、經濟、金融等等內容，都將進行編碼。

2.國外雜誌

⁹ Earl Babbie, 2004, *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*, NY: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.其中,「顯性內容」(manifest content)所指的是報導內容表面「特定的」字、詞、句子等,在判斷上較沒有爭議,而「隱性內容」(latent content),則是藉由一段句子、一個片段整體所形成的「主觀感受」進行判斷。

論證上海是否具有「全球城市」的特徵時，除了從上海本身出發，也必須從「全球城市」的角度出發，檢視其他城市是否認定上海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從「全球城市」出發，筆者選擇著名「全球城市」--倫敦所出版的經濟學人(The Economist)以及紐約出版新聞週刊(Newsweek)這兩份具有經濟背景的雜誌進行分析，希望從既有的全球城市觀點出發，檢視在國際觀點中，上海是否被視為「全球城市」，分析過程如下：

(1) 經濟學人(The Economist)

①選擇母體

由於倫敦出版的經濟學人期刊冊數完備，因此筆者將研究的母體鎖定為上海開始發展的 1990 年，並檢視 1990-2005 這 16 年間的期刊，即分別從第 314 卷第 7635 期一直到第 377 卷第 8458 期，設定為分析的母體。

②進行抽樣

由於經濟學人對於上海的報導部份較為稀少，因此採取的抽樣方法屬於立意抽樣(purposive sampling)，只要是文章標題、副標題、主題術語(subject terms)當中提到上海(Shanghai)者一律選取。

③分析單位

本研究所選擇的分析單位，為有關上海的每一篇報導

④觀察單位

為每篇報導當中的標題、副標題、主題術語與文章來源等各項。

⑤設定類目

在類目的部份，由於強調與上海的聯繫，因此在分析當中，區分為兩類：

①描述上海市內部的特徵

②上海市與國外城市的聯繫

與上海文匯報的分析相同，為了讓分析的層次更為深入，除了檢視有關上海的報導外，更進一步分析，所報導的內容，是屬於上海發展的哪一個部份，亦即屬於前面各章哪一部份的內容，在此前提下，設定相關類目，包含：

- ①人口特徵：涉及到人口的流動與人才的交流。
- ②空間規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具體建設聯繫，特別是在空運、陸路方面。
- ③經濟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洽談的經濟合作，以及產業發展。
- ④金融中心：涉及城市內金融機構的設立，如銀行、保險、證券等。
- ⑤貿易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經貿、商貿、展覽會、投資等。
- ⑥航運中心：主要涉及到城市之間的海運、河運、空運等內容。
- ⑦其他：即不屬於上述各個項目者，如文化方面的報導。

(2) 新聞週刊(Newsweek)

①選擇母體

與經濟學人的情形相同，由於紐約出版的新聞週刊資料能夠完整蒐集到，因此選擇的母體從 1990 年開始到 2005 年這 16 年的期刊，分別從第 115 卷第 1 期，到第 147 卷第 1 期。

②進行抽樣

與經濟學人相同，因為涉及到上海的報導數量較少，所以採取立意抽樣的方法，只要文章的標題、副標題、主題術語(subject terms)當中有提到上海者，一律選取。

③分析單位

本研究所選擇的分析單位，為有關上海的每一篇報導

④觀察單位

為每篇報導當中的標題、副標題、主題術語等各項。

⑤設定類目

在類目的部份，由於強調與上海的聯繫，因此在分析當中，區分為兩類：

- ①描述上海市內部的特徵
- ②上海市與國外城市的聯繫

與上海文匯報的分析相同，為了讓分析的層次更為深入，除了檢視有關上海的報導外，更進一步分析，所報導的內容，是屬於上海發展的哪一個部份，亦即

屬於前面各章哪一部份的內容，在此前提下，設定相關類目，包含：

- ①人口特徵：涉及到人口的流動與人才的交流。
- ②空間規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具體建設聯繫，特別是在空運、陸路方面。
- ③經濟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洽談的經濟合作，以及產業發展。
- ④金融中心：涉及城市內金融機構的設立，如銀行、保險、證券等。
- ⑤貿易中心：涉及到城市之間的經貿、商貿、展覽會、投資等。
- ⑥航運中心：主要涉及到城市之間的海運、河運、空運等內容。
- ⑦其他：即不屬於上述各個項目者，如文化方面的報導。

藉由分析這些統計資料，將可以看出上海在國際城市中的位階，以論證傅利德曼(J. Friedmann)有關「世界城市」的理論內涵，同時也可以藉由資料顯現出「生產者服務業」是否具有「集中性」，以檢驗上海是否符合莎珊(Saskia Sassen)對於「全球城市」的理論設定。抑或上海本身是否具有不同於歐美「全球城市」的特性，如希爾 & 金俊佑(Hill Richard & June-Woo Kim)所提出的具有亞洲特色的「全球城市」¹⁰。

因此，本研究期望藉由這種分析方法，從宏觀面以及微觀面來對於上海建構「全球城市」的過程，進行詳細的論證。

三、研究限制

本研究在進行論證的過程中，較受到限制的部份，在於以下兩部份：

(一)研究資料的不足

由於本研究所分析的時間長達十六年，且國內的中國大陸報紙並不齊全，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，只能夠以「立意」的方式選定國內所能蒐集到的報紙，

¹⁰ 希爾與金俊佑(Hill Richard & June-Woo Kim)指出，在既有的「全球城市」中，其發展模式並不完全相同，歐美的紐約可謂是以「市場導向」為主的「全球城市」，而亞洲的東京，則是以「國家/政府導向」為主的「全球城市」。這種分類的提出，顯示出在「全球城市」建構的背後，仍可能有不同的主導力量。

以及較具有公信力的國際雜誌，以探詢上海此一城市與全球其他城市之間的關連性，而在實際進行分析過程中，由於上海文匯報在台灣能夠蒐集的年代，是從 1994 開始，所以儘管「經濟學人」、「時代週刊」雜誌從 1990 年開始，但兩者年代會稍有不同，影響論證的基礎。

(二)深入訪談的對象

由於筆者的身分背景，未必能夠接觸到所有這方面領域的專家，同時只有訪談學者、台商，在論點上必然會有所偏頗。

因此，就整體研究而言，在以上兩方面的研究限制，將成爲研究過程中必須嘗試克服所在。

第三節 章節安排、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

一、章節安排

在本研究中，除第一章緒論外，其餘部份將分為六章，分別探討下列內容：

第二章文獻探討

分成三個部份，首先就「全球城市」的概念系譜做一個整理，並指出源於西方的「全球城市」概念，所具有的理論缺憾；其次，處理「全球城市」此一概念在中國大陸的應用情形，並指出中國學者在借用「全球城市」概念時，所做的引用以及補充；最後則探討欲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的上海市，從上海的發展，上海市政府如何在「全球化」的環境下進行職能轉變--不僅採取「治理」城市的觀念，更藉此提升城市競爭力，以及學者們對於上海能否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，所進行的研究結果。

第三章針對上海市的人口與城市建構進行分析

首先探討上海市在「人口」與「空間」兩方面的轉變，由於人口規模、分布和城市空間佈局，顯現互為因果的關係，因此這部份將探討「人口」與「空間」兩個變項的個別特徵，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。此外，由於空間佈局涉及城市規劃以及城市基礎建設，兩者發展均賴充足的資金，因此本節也將針對上海在城市建構方面如何獲得資源與政策優惠，特別是藉由「舉債融資」、「土地政策」、「房地產市場」等資金籌措方式，以指出政策因素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，來反映政府的治理能力，並舉出上海在空間佈局的具體重要成果，即浦東新區的成立。

第四章分析上海建構全球城市時所設定的四個中心

即國際經濟中心、國際金融中心、國際貿易中心與國際航運中心。在國際經濟中心方面，主要分析上海產業內容與結構，並指出其與城市空間佈局的關連

性；在國際金融中心部份，則分析上海目前在建構為金融中心時所面臨的內、外在競爭對手與困境，特別是來自北京與香港的壓力；而在國際貿易中心方面，經由對外貿易所增加的對外依存度，顯示上海在貿易中心方面的發展；在航運中心方面，指出上海除了在貨運量的增加外，在爭取大、小洋山作為深水港之後，對其航運中心的發展可能產生了實質助益，同時並分析航空港、信息港的建設。經由這四個中心的建設分析，顯示出此一「全球城市」的建構，不僅需要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，也有賴於中央所給予的優惠政策。

第五章探討上海與外部的關係

分成三個部份，一方面檢視上海市與長江三角洲各省市的關係，著重探討長三角各省市的發展特色，以及上海與各城市之間的聯繫情形，特別是長三角這16個城市之間的聯繫；第二部份，則藉由跨國公司的進駐，以分析上海在建構「全球城市」的過程中，如何與國外其他城市建立聯繫，也就是跨國公司是否進駐，以及相關的生產者服務業是否因此而發展；第三部份則採取實證研究，藉由內容分析法，分析「上海文匯報」、「經濟學人」、「新聞週刊」等三分報章雜誌，以檢視上海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之間的關連性，並論證此一建構屬於「區域型」抑或「全球型」的「全球城市」。與此同時，也訪問當地的學者與業者，分析上海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的可能性、外資企業為何選擇上海進行投資，以及進駐上海之後的反應。

第六章處理上海市在建構為「全球城市」背後的政治因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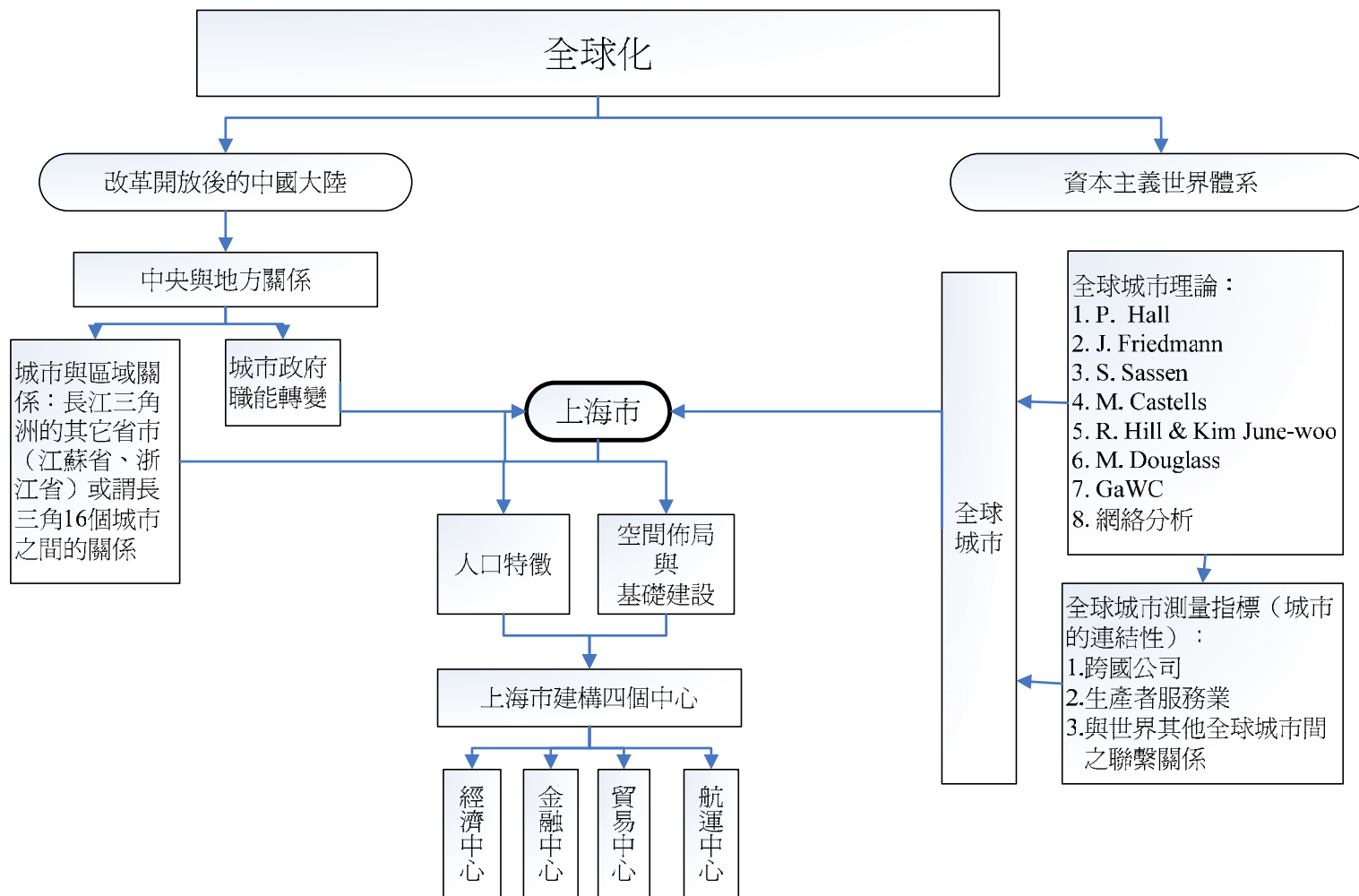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，使得上海在發展過程中，首先要觀察上海與中央政府關係的變化，分別從人事、政策以及財政方面的變化進行處理；其次，要考量上海市政府本身的職能變化，特別是上海市政府「治理」城市的能力，由於改革開放造成地方政府與三資企業的興起，使得地方政府除了面臨與中央政府在財政與人事的關係外，更必須考量政府內部與非政府部門的關係，因此，分析

上海市政府對於下轄各區、縣的權力下放，上海市政府與民間企業、外資企業之間的博弈關係，也都是用來檢視上海城市政府「治理」能力的重要指標。

最後一章，結論與討論

檢討上海市在經由前面各章的轉變與治理後，是否達成建構「全球城市」的目標，以及可作為後續發展的方向。

二、研究架構圖：



三、研究流程圖

